

感悟诗学的 现代转型研究

▼
欧阳文风◎著

GANWUSHIXUEDE
XIANDAIZHUANXING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感悟诗学的 现代转型研究

欧阳文风◎著

GANWUSHIXUEDE
XIANDAIZHUANXING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型研究/欧阳文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840-2

I. ①感… II. ①欧…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26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

责任印制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ass.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ZWC002）
与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BA224）结题成果，
并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841）、
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湖南省首届文艺人才“三百工程”、
中南大学首届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南大学531人才工程资助。

目 录

引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对诗学原创性的诉求	(1)
二 立足民族优势思维,建立一种感悟诗学	(6)
三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对诗学原创的意义	(9)
四 感悟诗学的研究现状及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18)
第一章 感悟辨析	(23)
一 感悟的内涵及其特征	(23)
二 诗悟与禅悟	(33)
三 感悟与直觉	(39)
四 感悟与玄学	(44)
五 感悟与心学	(48)
六 感悟与分析哲学	(55)
第二章 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悟特性及其现代转型	(60)
一 中国传统诗学的是一种感悟诗学	(60)
二 传统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型	(71)
第三章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发生	
——王国维的思维实验、理论构架与方法拓展	(94)

- 一 由极端到化合:王国维的诗学思维实验
——中西诗学思维方式的初步汇通 (94)
- 二 传承与发展:王国维的感悟诗学间架
——以《人间词话》为中心 (112)
- 三 观其会通,得其妙悟:王国维对感悟方法的现代拓展 (139)

第四章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展开(一)

- 朱光潜、梁宗岱对西方感悟观念的醇化 (165)
- 一 朱光潜对西方感悟观念的醇化 (167)
- 二 梁宗岱对西方感悟观念的醇化 (189)

第五章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展开(二)

- 宗白华对传统感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207)
- 一 宗白华对意境理论的创造性转换 (208)
- 二 宗白华对气韵理论的创造性转换
——以宗氏画论为考察对象 (224)
- 三 宗白华对传统感悟资源创造性转换的意义 (232)

第六章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方法垦拓

- 以闻一多、朱自清的古典文学批评实践为例 (242)
- 一 闻一多对感悟批评方法的现代探索 (242)
- 二 朱自清对感悟批评方法的现代探索 (265)

第七章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个案分析

- 以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为例 (292)
- 一 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 (293)
- 二 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的感悟特征 (300)
- 三 小结: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是一种准现代感悟诗学 (316)

结语 未完成的感悟诗学现代转型	(318)
主要参考文献	(326)
附录 “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型与当下诗学的原创性建构”	
专题讨论	(335)
后记	(348)

引 论

一 问题的提出：对诗学原创性的诉求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诗学^①的原创性问题就一直是 中国诗学研究者的一个心中之痛。放眼望去，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诗学几乎处处张扬的是西方诗学的旗帜——由世纪初的西方近代诗学的大量移入，到世纪中叶俄苏文论的一花独放，再到八九十年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轮番上演，近百年的中国诗学史简直就是一部贩卖推销西方理论的历史，在世界诗学舞台上，百年中国诗学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诗学者们并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比如一些学者就曾经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正含义

① “诗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诗学”是指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概念则指有关文学的一种类型——“诗”的理论研究。西方“诗学”概念的形成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写作相关，主要是广义的，内涵与“文学理论”相近，而非关于狭义的“诗”的学问和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使用，与西方大体相似。它大致包含三种含义：第一，“诗学”原是《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含义起源于汉代，在唐宋还被人们广泛沿用。第二，指关于“诗”的理论，这相当于西方狭义的“诗学”概念，主要指作为抒情文体存在的“诗”的理论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之学意义上的“诗学”，这一意义上的“诗学”概念的出现，大概在晚唐五代之际。第三，是广义的“诗学”概念，也就是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家、诗学家很少在理论文献中明确这一“诗学”概念，但由于“诗”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据的中心地位，中国古代文论的普遍概念和规范主要是在对“诗”这一文体的讨论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诗学”常常成为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我们这里的“诗学”概念，是就其广义而言的，也就是黄药眠、重庆炳先生在其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前言”中所说的：“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

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的）。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①“从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观念、体系、命题、术语的发生和缘起来看，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故乡’确实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为了民族复兴，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而且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国文学理论要想自立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就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总是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或当‘推销商’，或当‘二传手’，那是不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要有科学的‘原创’意识，要努力实现贴近文学现实的‘中国化’，这是每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论家的惟一选择。”^②论者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诗学发展的现状，也深切地反映了几代中国诗学研究者意欲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的心声。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诗学强势话语的包围和冲击下，如何去建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诗学？还依然是一个深深地困扰着当下诗学研究，令人束手无策、举步维艰的问题。

长期“失语”的焦虑，迫使着诗学研究者纷纷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种种重建中国原创诗学的思路，诸如“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西方现代文论的‘中国化’”，等等。近十多年来，最有代表性的思路主要有两种：其一，把眼光投向可与西方诗学相媲美的古代诗学，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希望从古代诗学遗产中获得某种理论资源，以便促进当下诗学民族特色的内在生成；其二，试图拓展诗学的研究方法，走一种“文化诗学”之路，以文化的民族性来凸显诗学的原创性。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把着眼点放在灿烂辉煌、独具一格的古代文论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古代文论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构建当代诗学，化古为今，古为今用，从而彰显当下诗学的民族蕴涵。这一思路的提出并深入讨论，充分体现了广大

① 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

② 董学文：《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论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巢湖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诗学研究者对传统民族诗学的自信心和执着的学术追求。十多年来,通过学者们积极的参与和颇富探索性的研究,以相当可观的研究实绩,从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古代文论的研究,并极大地启迪了当代诗学的发展建构。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这一命题却也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困惑。“如果不是停留在情绪化的鼓吹,而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来加以思考,则这个命题的学理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并且,在实践上如把它作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变革重建的理想出路甚至是唯一出路,也很可能导入误区。”论者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当下文学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以及语言、思维方式都与古代截然不同了,面对这种现实,要依靠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话语来对当代文学现实作出切实的阐释,已经是绝不可能的了^①。有学者就更是很直率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古人只是从经验和体验出发对诗文现象有所言说而已——这就是被古人称为诗文评的话语系统……这种入思方式和言说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诗文评永远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形态’,而主要是活泼泼的经验和体验。”^②“我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21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希望将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窃以为恐不免缘木求鱼。”论者说:“转换”命题是“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是不能成立的”。^③另一位学者也作如是观:“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④有论者在一篇题为《伪命题:中国古代

① 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8页。

② 李春青:《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 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页。

④ 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

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文章中，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认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文论，包含着不同类型的价值内核，在价值取向上两者在很多方面是迥异其趣的，因此它们之间是不可以转换的，如果强为作媒，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会出现许多问题^①，等等。在这里，我们虽然不愿完全苟同上述论者的说法，因为我们认为古代文论与批评形态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建构现代文论重要的资源库和智慧源，也主张应当从内在精神层面对古代文论与批评进行吸收融会，但是，对“转换”命题我们也确实心存疑惑：第一，“转换”的提法是否妥当？因为任何文化（当然包括文学理论）都是在合规律合目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衍生的^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种对古代文论进行人为的现代“转换”，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就值得思量。第二，关键是如何“转换”？正因为“转换”命题的大前提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如何“转换”就成了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学者们虽然也提出了各种设想，但平心而论，我们至今都没有拿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可供操作的“转换”方法。其实，正如有人所说的，如果可以“转换”的话，20世纪初应该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变革转型，为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同步转’的适宜的转换速度、弯度和坡度；并且，从近代文学改良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的改良派，可以说都是一些饱学传统文化，甚至学贯中西、并具有现代变革意识的文化精英，如果由他们来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但是，当时的那些文化精英们在做过了这方面的努力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作出‘西化’的文化选择”^③。当然，历史现象背后往往还有很复杂的其他原因，但这种选择结果本身是值得我们“转换”论者深思的。

① 尹奇岭：《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欧阳文风《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论中国古代文论的衍生功能》，见蒋述卓主编《批评的文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③ 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走向文化诗学”的命题则是希望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界限，通过突出文学研究的文化特色来实现诗学的本土性与原创性。这种思路也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文化诗学试图整合各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整体的、多元互动的跨学科跨方法的综合研究。在批评界经历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双重尴尬之后，这种综合的方法正是我们目前所极其需要的。而且，它的跨学科性也有助于文学研究摆脱纯粹的自在自为状态，在纯审美的局限之中介入非审美因素，使原先被遮蔽的或者是无法观照到的盲区得到澄清。它的跨方法性使它吸收了诸多方法的有效因素，能在具体运用中使这些因素脱离原先的具体指涉而对文学批评发挥新的作用^①。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化诗学”研究也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不错，文化诗学对文学研究最大的优点是综合了既往所有的研究方法，是跨方法跨学科的，然而关键是，其致命的弊端也恰恰体现在它的这种跨方法跨学科上。我们知道，从当下的文化诗学研究来看，文化诗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呈现出一种泛文化研究的倾向，有人称其为“文化价值主导型批评对美学价值批评的无情置换”^②，而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却会从很大程度上消解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热衷于环境污染、广告和模特表演等方面，成为了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将导致文学文本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失去了文学理论起码的学科品格。”^③有学者就曾经指出说，文化研究“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是“对文学的贬低”^④。J. 希利斯·米勒更是说，文化研究“常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个倒退，退回到把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化创造物视为单纯的模仿和再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等文化创造物不过是外部世界

① 王林、姚朝文：《文化诗学批评与批评生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王世诚、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③ 王泽庆：《文化诗学理论批评》，《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

④ [德]沃尔夫刚·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中越界——沃尔夫刚·伊瑟尔访谈录》，金惠敏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如著名的‘种族、阶级、性别和历史状况’)的反映”^①。理查德·约翰生也说: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消解‘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材料……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包括它们的文本体现。这与对文本本身进行文学评价还距离很远”。^②这也就是说,如若文化诗学不从实践层面上的这种泛文化研究倾向中剥离出来,最终就会导致文学研究逐渐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那么,它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更遑论对诗学原创性的有机生成了。

由此说来,上述两种思路——一个立足民族资源的开发利用,一个注重对已有研究方法的综合融会,虽然在逻辑起点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活跃了最近十多年来的诗学研究,但是,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和实践困惑,使得它们在实现当下诗学的原创性诉求上依然困难重重、步履艰难。然而,它们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既然建构原创诗学是建立一种有别于其他诗学(主要是指西方诗学)的诗学,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两个问题:中西诗学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和西方诗学相比,我们的优势又在哪里?我们认为,如若明确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且能够在自己的优势点上着力,建设诗学原创性庶几就能够有的放矢。

二 立足民族优势思维,建立一种感悟诗学

曾有论者指出:“思想史、科技史和艺术史分明地显示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论者还说:“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论者主张“用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③这个论断无疑

^① [美] J. 希利斯·米勒:《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金惠敏译,《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英]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是极有见地的，它启示我们：要把握中西诗学的本质区别，我们还应该也必须深入到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去。

众所周知，中西诗学在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上具有极大的差别，西方诗学注重的是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铸就了西方诗学条理严密、逻辑贯通和表述清晰的体系特征，而中国诗学则注重的是感悟体验的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感悟思维^①，感悟思维培育了中国传统诗学直观体验、灵气飘逸和整体把握的生命形态^②。中西诗学之所以迥然有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不同，应该是中西诗学最本质的差别所在。而各自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其优势，也即西方诗学的优势在分析推理上，中国诗学的优势则是感悟体验——感悟，既是中国诗学独步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诗学相对于西方诗学的优势所在^③。由此，根据我们以上的理论预想，要在当下建立一种中国原创诗学，就应该在自己的这一优势思维——感悟思维上着力，根据自身思维的特点和传统，扬自己之长——感悟，补自己之短——学理分析，并将两者融而合之，构建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

感悟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诗学最常用的方法^④。古代诗论家大都是直

① 也有学者称之为直觉思维、悟性思维、悟觉思维或象思维。

② 应该说明的是，西方诗学也有感悟体验，中国传统诗学亦有分析推理，我们如此言说，只是就其主要表征而言，并不是绝对的。

③ 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论述，虽然用的不一定是“感悟”这个词，有的用“悟性”，有的用“直觉”，有的用“体验”，等等，但概念内涵所指是基本相同的。其中以杨义先生论述最为精到，杨义说，假如我们对数千年间久蕴厚蓄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感悟，就是这感悟，乃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它在本能和认知、情感和理智、知识和哲学等诸多层面，给中国智慧提供了奇妙的融贯和升华的通道”。“数千年的思维实践，使中国感悟式的思维经验和智慧异常发达，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各个领域，沉积为中国精神文化最具神采、又极其丰厚的资源”（《感悟通论》）；“感悟思维作为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较之意境、意象、神韵一类词语具有更深刻的关键性，或者说，意境、意象、神韵都是感悟思维导致的审美状态和审美结果”（《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在《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一文中，杨义更是明确地提出中国诗学是一种感悟诗学，他说：“中国的诗学又是一种感悟的诗学。……中国的诗学从心讲到诗言志讲到诗缘情，它既有生命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有感悟作为贯穿它的方法。”

④ 关于感悟的内涵及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悟特性，本书将辟专章论述，此不赘言。

接立足于具体的文本之上，依凭自己独特的感悟，或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或引发开去，敷衍成篇。感悟，注重的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诗论家追求的不是严密完整的作品解读，而是主客体内在精神的契合和心灵沟通。中国古代感悟诗学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姿态向世界诗学宝库贡献了“虚静”、“得意忘言”、“风骨”、“滋味”、“妙悟”、“意境”、“神韵”等一系列极具民族性当然也是原创性的诗学命题和诗学资源。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整个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更，时过而境迁，古代的这种缺少科学的观察、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推理和实践的检验，缺少必要的规定性、清晰性、准确性，具有较鲜明的神秘主义倾向的感悟思维，到了新的时代还行得通吗？的确，应当承认的是，“当人类掀开了近代史的帷幕之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就逐渐暴露了”^①。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民族文化的衰败，那些探索文化振兴和民族出路的近代精英们，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他们把民族落后的原因归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不科学，一方面极力鼓吹西方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发起了亘古未有的批判和攻击，感悟思维受到了西方理性思维的强力挑战^②。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反传统”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中，以及20世纪20年代那场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极其深远的“科玄论战”之后，作为传统思维方式的感悟思维愈加被激进的现代中国人弃若敝屣，人们争先恐后地学习西方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法。一段时间下来，中国固有的感悟思维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来说已经逐渐变得生疏和遥远，而相反，西方理性思维的方法却慢慢深入人心。王国维是中国诗学建构中尝试着运用西方思维的第一人。他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破天荒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整个文章纵横捭阖，条理密贯，有一种磅礴的理论气势，一扫传统诗学那种印象式感

①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 人们自觉地提出要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是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参见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悟式的评点风格，其思维方式是思辨的、逻辑的、智性的，是十分西方化的。尔后，王氏又相继发表了《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等诗学论著，虽然在形式上似乎有一步步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明显是西方的。1908年，王氏还翻译了逻辑学著作《辨学》，表达了他对西方科学思维方法的向往和追求。自王国维之后，中国诗学理论便四处弥漫着西方理性思维的气息，在所谓的诗学理论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感悟思维逐渐淡出中国现代诗学的生长构建中。

然而，感悟思维作为一种中国文化沉积数千年的思维方式难道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吗？不是，也不可能。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一经积淀而成就很难更改和转变。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任何民族的前进，都只能以本民族为行动主体。民族思维方式的改进和变革，绝不可能从白纸上做起，不可能也不应当把原有的传统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而去全盘接受人家的东西。别人走过的路，只能供我们借鉴，而不可能重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过去”^①。“艺术发于心性，艺术传统、艺术批评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这就决定了长期形成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批评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会消失。”^②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却必须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

三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对诗学原创的意义

杨义先生说：“走向现代形态的感悟汲取了新的时代智慧，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上梳通古今脉络，沟通中西学术。它似乎不再到处卖弄自己的招牌，而是潜入历史的深层，埋头苦干，不动声色而又无处不在地醇化着和升华着新的审美创造和知识体系。它大体舒展着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

①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 赖力行：《体验：中国文学批评古今贯通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转化和重构；二是对外来的诗性智慧和学术观念，进行中国化的接纳、理解、扬弃和融合。”在这里，杨义清楚地勾勒了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进行现代转型的路径，主张现代感悟诗学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又要通融于西方诗学理论。现代意义上的感悟应该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同时是二者的混合体，是桥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或“直觉的理性”。“悟性得来的东西，还需要经过事实的验证和理论的推衍而形成创造性的体系。……必须把感悟继之以条理清楚的分析，成为有体系，有结构，有不同层面的理论形态。”^① 值得庆幸的是，在王国维、宗白华等所开展的诗学实践中，其实已经惊人地暗合了杨义所概括的这两条感悟思维和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如前所述，王国维是中国诗学运用西方思维方式最早的尝试者。其实，王国维之所以大量地运用西方的逻辑推演的思维方法，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的。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对中西思维的特点进行了清醒的比较：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在王国维看来，我国传统思维短于思辨推理，缺乏抽象、分类的科学方法，因而难以建立概念明晰，推理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进西方哲学理论，尤其是引进

^① 杨义：《感悟通论》，《新国学》2005年第2期。